

王安忆的文学思想路线图

——读《成长初始革命年》

■ 几又



《成长初始革命年》
王安忆著
译林出版社出版

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河流，每一条思想的河流都有地理、时间、空间、环境等多重意义的源头。

本书所辑 17 篇文章，汇聚的是王安忆近半个世纪不同时期的心旅历程，每篇文章就像是一条不同的涓流。这些文章从王安忆的身世谈起，一路穿过绍兴、徐州、上海，走进新世纪，飞跃维也纳、巴黎与美国西部。王安忆将 17 篇文章分为四大部分，体裁各异，创作初衷不同，但总体上彰显了其个人文学成长过程的四个阶段，即从社会的求学者，到参与者，到阐释者，再到国际文学和艺术体系的融入者。阅读这些文章，就像是追寻王安忆文学思想的路线图。

1986 年，王安忆前往浙江绍兴茹家渡——母系祖居寻根。那时全社会刚走出革命年代，人们不再在亲情中划清界限，家族文化传承回归于传统轨道，社会“寻根文学”走向勃兴。寻根，某种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精神原乡。另一方面，人就像棵树，越是渴望长成参天大树，越会强化对根的深深眷恋。对于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王安忆来讲，这次寻根的意义不仅在于梳理日渐清淡的血缘关系，还在于深入到改革前沿地带基层，亲身感受思想的嬗变涌动。几乎每个为王安忆提供帮助的当地基层干部，都会不知不觉地谈到正在推进的项目，摩拳擦掌，踌躇满志。

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顺理成章地会传递到王安忆这样的个体。革命年代她曾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凭一腔热血，委身苏北徐州文工团，后又辗转于安徽农村。知青经历给王安忆留下了深刻但并不美好的记忆，后来许多变成了文字，或者转化为她的创作灵感。当这段岁月终于熬到结束之时，“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，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，简直目不暇接”。

所有巨变，全因此前的未变。书写革命年代，作为经历者，王安忆自然信手拈来。虽然那时家里并未遭受太大的劫难，但全家人生活受到影响。相比之下，小学同学董小苹则是被恐惧笼罩的一个重要缩影：从“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”，到后来父母被打倒，转眼便矮人三分。王安忆笔下的董小苹，与严歌苓笔下的何小曼（《芳华》里的女主人公）有着某些类似。倒不是说这两者有何雷同之处，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，人物命运的基调往往大同小异。

后来的董小苹变成“两个人”。一个是她的外在表现，越来越

直面现实，不怨天尤人，而是通过巨大的付出，为自己以及家人寻找一个苟安之地。也所以，王安忆感到，“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”。另一个是她的内心，尽管她始终表现得小心翼翼，但“她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，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”。王安忆由衷感慨，“这一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”。

1983 年，王安忆第一次前往美国，见到了作家陈映真。对于刚

走出思想长期禁锢的王安忆，她像许多年轻人一样热情地拥抱消费社会。对急于了解内地年轻作家思想的陈映真，眼前的王安忆对物质生活的热情超出了他的想象。用王安忆的话说：“在那时候，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。”也正是遇见陈映真，“使我在一定程度上，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。”

王安忆写到自己作为中国文学的阐释者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，写到自己与同龄人陈思和的思想对谈，写到对拉美文学崛起的深刻认识，写到走进音乐之都维也纳的点点滴滴……一路走，一路写，但她并非单纯的记录者，而是充满理性，尝试用自己的思想去度量所经历的一切，甚至连维也纳这样高大上之地也没逃过她的批判。在她看来，这座城市所居的音乐高雅地位，未能全部遮蔽其市侩化。就国内文坛追捧的拉美文学，她对那个时代最“脍炙人口的语录”即“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”亦存质疑：“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，谁担任看客呢？”

批判，是王安忆文学思想不断凝聚升华的结晶，但她并非为批判而批判。她从自身出发，然后又从社会返观自己，“再掉过头寻觅遗迹，重新出发”。她不惧世俗眼光，认为知青下乡后不是知青改变了农村，“中国落后的农村文化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了他们，吞噬着他们身上萌芽状态的现代文明”。谈到两年的农村生活，她对一些农民身上的陋习直言不讳，认为他们“绝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气质，他们太穷，贫穷实在是件很坏的事，人穷志不穷是少数人的事，多数人是人穷志短”。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经历者，对于王安忆这种凌厉的批判，笔者感同身受，同时又深深觉得，许多短视行为，不只是知识性、传统性的，更是长期以来的劳动本质所决定的，毕竟几千年来他们经常面对靠天生活的太多不确定性。

在王安忆所谈的年代，总有一些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良心底线。比如那个因一次工作失误而被辞退的保姆，尽管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不如意，但她并不愿受人怂恿而去“告发”她的原主顾。正因如此，那个年代给王安忆留下的不全是人性的恶，还有董小苹那样的真，保姆这样的善。

寻找人性，讴歌人性，乃文学永恒的主题。回溯王安忆的思想路线图，正是不断探寻人性的漫漫历程，这何尝不是所有文学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之路？

走读江山著新史

——读刘刚、李冬君《文化的江山·第一辑》

■ 寇德印

《文化的江山》从史前文明写至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属通史性著作。作者旨在导读，循其对中西历史的精研与思考，揭示他们的发现与创造，引领读者学习、反思。

全书第一部《文化中国的来源》，介绍与阐释文化中国的概念以及分析文化中国发生、发展之内在因素。

何谓“文化中国”？首先将其与“王朝中国”进行比较。王朝中国是在二十四史里的中国，充斥着帝王将相，但城头变幻大王旗，几千年下来，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轮转，历史仍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漩涡中打转。这样看历史，不是被奴化、教化就是被卷入血淋淋的斗争，成者王侯败者寇。

文化中国的评价体系不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依据，而是基于某种文化认同所沉淀下来的凝结于人性之中的审美意志。“文化中国”的自然形态是江山，社会形态是整个民间，文化形态则指全部的历史。

所以，《三国志》是“王朝中国”，《三国演义》尽管所记述的史事多有荒诞，但仍是“文化中国”，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对义、对善的追求与执着。

其实，“文化中国”的概念并非本书作者首创。此前，“文化中国”是边缘，是注脚，是儒家所谓的“道统中国”。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揭示了“文化中国”并非“王朝中国”的附属，而是先于“王朝中国”而存在，它才是中国而为“中国”的本质。

关于此理论如何成立，请读本书。本文着重介绍作者的研究方法。

其一，作者研究历史的视角——以世

界之眼观中国。如某种考古的新发现与世界其他考古发现之比较、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之比较、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之比较等，形而下有之，形而上亦有之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方面：识其地位，析其特色。

作者在文明区系的比较中，发现了中国的独到之处。原来，在文明初曙之际，中国未如其他古国那样直接进入“青铜时代”，而是经历了以“审美”为标志的“玉器时代”。此“玉器时代”以文化认同为纽带，形成某种联合体，即为“文化中国”之滥觞。

其二，作者研究历史的起点——以神话传说论文明。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从古猿变成人处着笔，本书作者则不然，从神话述起，从传说开端，将历史与神话打通。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，从《圣经》的伊甸园讲起，以“原罪”起笔，而对中国历史，则从《山海经》开端。

传统观点认为《山海经》杂乱疏略，多神鬼之说。作者读此书，却如获至宝。此书讲山川地理，讲矿藏，有金有玉，记述了由石器向青铜器过渡的时代，此际之中国，正站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。

作者认为，在《山海经》的世界里，不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，而是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。在石器时代，人的理性未开，而灵性已存，灵性的表达就是神话。《山海经》记录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形态、从族群状态走向国家形态，以至于从古国走向方国、从方国走向帝国萌芽的过程。

其三，作者论证历史的方式——对考

古学的再整理。

以王朝史观写历史，从夏开始。但是夏始于何时？仍有争论。

商、周等有文献记载，亦有考古发现，“有册有典”，是信史。于是，在王朝史观和史官文化的映照下，考古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寻找传说中的夏，考古学成了历史的“修补术”。

但是夏朝一定能找到吗？否。因为它可能真的不存在。或许夏朝根本就不是一代王朝，而只是处于向国家过渡的阶段。按现有的史学理论，国家要有城市、文字等，商朝具备这些条件，而夏很可能就不具备。如果抛却王朝的观念，从不同地域各种文化的类型中去考察，则可豁然，因为有那么多的考古发现证明，许多遗迹之间具备相似性或统一性，这些关联会不会就是夏的最初形态？

作者对考古学的运用，就是通过对考古成果的再整理，来分析不同文明的共通性，以此勾勒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。

其四，作者思考与著作的特色——走读江山。

本书两位作者写历史，特重空间格局的考察，此非身至其境所不能得也。

文化中国，根不在庙堂，而在民间。作者未将自己关在书斋里，他们的方式是走出去，从东北到西南，从沿海到大漠，沿文明遗迹及各大博物馆一路考察。

走读江山的结果，作者得出两个重大发现。

第一，“良渚化世界”。



《文化的江山·第一辑》
刘刚、李冬君著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通过对不同文明区系的比较，作者发现，良渚文化是向西南和西北传播。往西南，进入皖赣、闽粤、巴蜀，并与当地文化相融；往西北是主流，沿其轨迹形成一条“玉石之路”，从扬州往雍州，从瑶瓊往球琳，这条玉石之路形成了一个“良渚化世界”。

在那时，玉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标识，同时还成为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和个体的人格范式，不仅国家制度取法于玉器制作，发展出制度文明的规范，而且个体人格也向玉的审美属性看齐，从而形成了精神文明的标准。故曰，最早的中国，从玉中诞生。

第二，中国历史运势的“十字架”。

作者发现，中国历史发展有两条路线，一条从东南往西北，是良渚文化的路线；另一条从东北往西南，是红山文化的路线。两条运势线，形成中国历史发展的“十字架”。十字交叉，形成南北两条农牧分界线，南线为“龙门——碣石”，北线为“长城—阴山”，十字架的交点即是中原。

上述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，只是梗概，仍有未尽，有待读者阅后各自总结。

学历史有什么用？通常的回答是“资治”或“以史为鉴”，其核心不脱“用”字。读《文化的江山》，似有顿悟，其实学历史更重要的是学一种思考方式，最终的目的，是用独立的眼光审美，用自立的方式做人。